

纪念

《最后的电波》:致敬我的父亲母亲

□季宇

在我父母先后离世后,整理他们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套《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看到这套资料,我心里突然感到一丝内疚。

我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我父亲季经龙,江苏泰兴人,1921年生人,属鸡,高小毕业。他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艺术家,高小毕业后一度离家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那是1940年,由于有文化(高小毕业在当时已属难得),被分配到军部电台工作。但他对艺术的爱好丝毫未减,在战斗之余画了不少速写,但留下的很少。“文革”前,我曾见过一本速写册,是他自己装订的,纸张已经发黄,画的多是一些景物和部队生活。1983年,父亲离休后,又重新拿起画笔。据我弟弟评价说,老爷子画得挺不错,只是缺乏专业训练,功力稍差点。我弟弟季红跃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曾在全国美展中多次获奖,并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拿过银奖,这是安徽在全国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至今无人打破。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小儿子,除了因为他排行最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艺术梦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我母亲原名贺凤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志健,江苏丹阳人,1928年生人,属龙,也是高小毕业。她家里的成分是破落地主,为此她感到很不光彩,一直讳莫如深。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的一份表格,才知道她的成分,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一个坏名词。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弟妹,不知怎么传到我母亲耳中,她大为光火,先是纠正我讲错了,她的成分不是“地主”,而是“破落地主”,好像后者比前者要好一些;尔后又指责我不该翻她的东西。那次,她发了很大的脾气。其实,她冤枉了我,那张表是她自己不小心落在桌上的,并不是我故意翻的。

我母亲参加新四军是1945年。据她说,在学校期间,她读了不少进步小说,像巴金的《家》等,思想上要求进步。当时,她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名叫张卿,解放后曾在安徽省物资局工作。在这个地下党老师的引导下,我母亲和一些同学秘密地投奔了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在苏北,她们是通过地下党联络站,从苏南被一站一站送到了苏北。到了部队后,我母亲她们这批有文化的学生,或被送去进行医务培训,或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我母亲被送去进行无线电培训,后留在军部电台工作。我父亲与我母亲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

虽然我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我从心里对他们并不十分佩服。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太平凡,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他们甚至没有冲过锋陷过阵,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小学时,有个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做报告,拉开衣服,身上布满了刀疤枪伤,赢得了一片掌声和惊呼,让我们崇拜不已。可我的父母身上连块伤疤都没有。有一次,我说起这事,我母亲笑着说,你哪儿懂?电台的重要性,可比冲几次锋,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

父母的老战友多是从事通信工作的,有时从外地来,到家里吃饭,大家谈起往事,也大多与电台的工作和生活有关。从他们的口中,我知道了曹丹辉、廖辉这些名字,他们都曾经是新四军电台的领导。因为军部电台与军首长形影不离,他们也常谈到陈毅、粟裕等首长。这些首长的性格和工作习惯虽不同,但对电台都极为重视。据说,遇到重要的事情,陈毅、粟裕等常常会亲自来到电台旁,守在一边,等候电报。我父亲说,我军的电台初期很落后,技术力量也很薄弱。电台设备多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技术上只能依靠从国民党俘虏过来的电报员,或从地方上找一些无线电技术员来教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不错,慢慢改造过来,经过锻炼成了我军电讯方面的骨干;有的则靠不住,关键技术不肯教,遇到危险和艰苦环境,还有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的。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个情况才逐步改变。

据我母亲说,我父亲的技术很好,在军部也是很突出的,很早就当上了通信参谋。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出事后,延安曾指示军部

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这才向延安报告。解放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他已经被捕了。

我父亲由于长期在电台工作,经常熬夜,加上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民间俗称痨病,相当于现在的结症,后来有了雷密封才逐渐控制住。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受到冲击,关进牛棚。记得有一次数九寒天,他被造反派推上汽车游街示众。我那时已经上了中学,每次去牛棚送饭都感到很屈辱。而负责看守的造反派怕我们传递消息,每次送饭送水都要把送的饭菜倒进另一个碗中扒开来看,送去的开水也要倒进另一个水瓶中过一遍才放心。由于天寒地冻,经过这样一折腾,热饭热水也变凉了,这让我非常气愤。有一次,我联络了几个好朋友,打算在这几个造反派晚上下班时,趁黑砸他们的砖头。但事到临头,我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担心这样会给我父亲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个性坚强。他做事极为执著,认准的事从不放弃。他的口头禅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凡事都要努力。干成干不成是天意,但如果干不以后就会后悔。他的这种人生哲学对我们子女影响很大。199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走后,我母亲显得十分孤独。但她喜欢静,不愿和子女一起生活。我妹妹原打算和她住在一起,可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嫌人多吵闹,最后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和弟妹轮流去看她。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向我们聊起过去,聊起在部队上的事,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应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鲁运庚教授邀请前往临沂。我母亲听说了,便对我说,临沂城里有一个天主教堂,部队南下时,她们曾在那里住过,你去看看可还在。我到了临沂,问起鲁院长,他说在。第二天便陪我去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这座教堂保存完好。在教堂后边,当年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现在还建起了纪念馆,陈列了陈毅、粟裕等领导的照片和曾经用过的实物等。据教堂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司令部,周围的一些房子里也住过部队。我把这些房子都拍了下来。回去后拿给母亲看,她显得很激动,依稀记得电台当时就放在右边的那一片房子中。她还说起她们驻扎在那里的一些趣事。比如,南方人不吃大葱,闹了不少笑话等。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坐在桌旁写什么。一问才知道,《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向全国通信兵老战士约稿。一些老战友也来信让她写点回忆,为通信兵史提供点资料。她把约稿信和老战友的来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约稿信,最早的一封时间是1989年9月11日,那时,我父亲还健在,而且有些来信是写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的。我问她,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想起要写了?我母亲说,那时你爸爸还在,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他不在了,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为他留点回忆。听她这样说,我心里一热。我知道她在思念父亲。她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总是很节制的。许多感情常常放在心里。我当即表示,这个值得写,你写好后,我来帮你润色。母亲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又把这事搁置了。我问她怎么不写了。她说,人老了,眼睛不行了,手也不灵光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写吧。我说好啊,这事不急吧。她说,不急,什么时候你有空再说。可我那段时间太忙,也没太重视,心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的是,2013年,我母亲查出了胃癌。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们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因为她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一些老年常见病,基本上没什么大病,尽管那一年,她已是85岁高龄。

母亲去世后,当我看到这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时,突然想起当初对母亲的承诺,便感到很后悔,也很难过。其实,写一篇回忆,对我这个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我却忽略了,如



工作中的通讯兵

今想弥补也来不及了。

回到家中,我专门抽出时间来翻阅起那一本《选编》。《选编》是内部资料,已经印到第七辑。纸张、印刷都很粗糙。其中有一本《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干部名录(建国前部分)》,是1990年7月编印的,居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并油印后装订成册的。《名录》中有些人的名字前用铅笔打了勾,不知是父亲打的,还是母亲打的,我想,这些打了勾的可能都是他们认识的战友。在《选编》中,有一些回忆出自父母老战友的手笔,他们在回忆中也提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看到这些,我就更后悔了,深感没能帮我母亲完成她的心愿。不过,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从一篇篇回忆中,我开始对通信兵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其实很了不起,虽然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作战,但许多指挥千军万马的指令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指发出的,而他们经历的艰苦,面临的危险、困境,以及付出的牺牲,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尽管他们的事迹不显山不露水,也很难惊天动地,但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而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

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父母的生活,写一写关于通信兵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

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许多真实的人和事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和事有的是从我父母那儿听来的,有的来自于史料和回忆,因此故事的细节和通信兵的战斗生活都是真实的,有依据的。最后,有两点感想值得一提:

一是,过去常听人说,写作要带着感情写。对此,我体会不深。但这次写作,由于涉及到我父母,写作中总感到父母亲的身影在眼前晃动,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向我娓娓道来。小说中多次插入父亲的讲述,就像纪录片中的同期声,我这样做一来想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二来视角上的变化,也使父母过去与我讲的一些人和事变得鲜活起来,自然地流于我的笔下。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我母亲获得了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我们回家时,她兴冲冲地拿出来给我们看,还高兴地哼起了《新四军军歌》。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我父母亲都对《新四军军歌》饱含深情。我母亲80多岁了,还能够哼唱。为了找到写的情境,我特地从手机上下载了《新四军军歌》反复不断地播放。听着那悠扬、雄壮的旋律,写到动情处,我的心里也抑制不住阵阵发热。

二是,去年春天,我们去新疆采访。新疆建设兵团政委孙金龙同志,曾是我们在安徽的老领导。他接见我们时谈到一件事。兵团有个老兵,解放初进疆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一生都奉献给了新疆。到了晚年,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和家人,但你问他哪个部队的,他会立马报出某团某营某连某排某班,而且分毫不差。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小说中的李安本在身患老年痴呆多年后,临终前突然敲出了“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电码,就是受这个故事的启发。这也再次说明了,创作离不开生活。

生活质感

闽西是我向往的地方,今年有幸作为中直党校春季班的学员,到闽西进行为期一周的社会调研活动,正好遂了我的心愿。

瞻仰金谷寺时正赶上全寺建筑维修,处于封闭状态,在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之后,我从脚手架中艰难穿行,完成了朝拜之旅。

时值5月初,闽西一直阴雨,但是这天,罕见万里晴空。永定党校校长开玩笑地说,你们是幸运之星,给永定带来罕见的好天气。我们当然不是什么幸运之星,但是对于此次闽西之行,我们一行确实是虔诚的。

此次闽西之行,我是做了功课的,作为作家,我原本想好好了解当地的客家文化。我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所以一直将它视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当然这仅仅是我一家之言。因此这次闽西之行,我试图寻找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客家文化当然让我沉迷,但是处在客家文化包围之中的金谷寺却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说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不可忘。不仅是我,很多人以为,如果感到内心的焦虑与黑暗,请去寺廟吧,那里会让你的心情平静下

来,会让你清醒与悔悟。佛家讲一切都是空,万事万物皆为佛。佛会给人指出一条道路,这就是修行。修行是自我的,是讲究隐忍的,是本着将自己也修炼成佛的心态,自己忍受世人世间所有的苦难以普度众生为目标,以打坐诵经为路径去实现的。我想金谷寺作为佛教场所,千百年来的功用大致如此。

时光前移90年,一直以来作为佛教场所的金谷寺,发生了一件震动神州与佛教无关的大事,而让人们深刻铭记它的存在,这就是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永定暴动。以张鼎丞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在金谷寺里成立了工农红军军营,时隔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8月,溪南区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并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区级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永定的土地革命大幕就此拉开,如今,金谷寺被称为中国土地革命的摇篮。

此时,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两个意象并存,相互交织又独立显现。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共产党人。前者是神,后者是不信神的一群人。彼此的观点不同,但是对于追求的结果来说,又如此惊人一致。佛度芸芸众生,共产党人又何尝不是为了芸芸众生呢?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金沙镇的金谷寺,大

门两侧镌刻着这样的对联:“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以东岳。”我理解的意思是:来自西天的佛祖,守护着东方的众生。大殿供奉着客家人保护神定光佛。寺院不大,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0平方米。这样规模的寺院相比全国众多寺院,极为普通,更何况身处闽西群山深处,位置偏僻,交通闭塞之环境难以让其跻身名寺之列。我想,自金谷寺建立开始到上个世纪初,近千年时光都大致如此。

历史往往会有戏剧性的转折,近千年一代又一代僧众的艰苦修行,并没有改变东方芸芸众生的命运。而在90年前一群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借用了佛祖的地盘,用了佛祖来到闽西大地十分之一的光阴,彻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命运。这片大地上生活的人民,近千年的穷困潦倒变成今天的生活富足。

我亦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虽然不信佛,但是对其充满敬意,佛从教化人心的角度或许能将人心中的邪恶转变为善良,让人们学会放下、学会舍得,这点确实有其现实意义,这是它的功用。但是真正改变人民的命运和生活,还是靠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在现实中的斗争与奋斗。

这是16年前的往事。

2002年初,时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寅查找我,研究出版《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要出版这套书的是齐齐哈尔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李延龄。李教授196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后到齐齐哈尔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当教授。他看重俄罗斯文学,从1967年开始收集上世纪中叶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作家发表在俄文报刊上的作品,有近一个麻袋。从中选出一些翻译成中文,要出版一套五卷本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此书由部里组织论证后,报省委领导刘东辉同志,他支持出版,并批准了一些经费,指示专款专用。按规定由我们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后,上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后方能出书,我请寅奎通知要出版此书的北方文艺出版社报选题计划。

回来后我看了一些俄侨的资料。1898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大批外国人涌入哈尔滨,使之成了国际新城。1913年1月14日中东铁路有个统计,在哈有53个民族,使用45种语言。哈尔滨人口有6.8万之多,中国居民2.3万,而俄罗斯侨民3.4万。这些侨民中有些专业或者业余作家,他们成立了“丘拉耶夫卡”文学社,在《远东报》《前进报》《亚细亚时报》等有文学栏目的俄文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还出版了不少小说、诗集、杂文集等,创作成果颇丰。

看着材料,一段儿时的记忆突然涌了出来。我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哈尔滨,住在马家街44号,一栋原中东铁路技术员的俄式住宅。有位单身俄罗斯街坊,是眼科医生,印象中他冬天不戴帽子,穿件呢子大衣,拎个装得满满的皮包匆匆忙忙上下班。夏天他看见我们分两伙在街上踢球,就停下来说呀依格拉优(一起玩),我们大伙就说哈拉少(好)就一块踢了起来,他踢得真好,不知为什么大家叫他斯拉夫人,还有一个街坊,家里有位胖奶奶,她家有位女孩,大我几岁,叫瓦黎莉,我经常到她家去玩。记得一次我看奶奶对着窗户大声朗诵,好像在说克拉细娃呀拉细呀,克拉细娃呀哈拉宾。呀留比留拉细哟,呀留比留哈拉宾。她回头看见了我,我紧张了,怯生生来了句克拉细娃布什嘎(美丽奶奶)。她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走进里屋,在一个铁盒子里拿出几块哈尔滨秋林公司的酒心巧克力放到我手里。我惊喜得转身就跑,嘴里没忘说句斯巴细巴(谢谢)。在瓦黎莉的小屋,将酒心巧克力与她分享。瓦黎莉说看来奶奶真高兴了,从来没有给我过这么多糖。我问瓦黎莉,她是不是说哈尔滨美丽呀?瓦黎莉说,奶奶在朗诵她的诗,美丽的俄罗斯,美丽的哈尔滨。我爱俄罗斯,我爱哈尔滨。奶奶除了在铁路中心医院上班外,还是个诗人,在道里文学社写诗、朗诵诗,有不少发在报刊上,还出过书。真没想到这位老奶奶竟是位了不起的诗人。这段经历多少印证了俄罗斯侨民上个世纪在哈尔滨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有组织、有规模、有成果的。他们的作品大多怀念自己的祖国,对中国、中国人有感恩赞美之词。应该说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中俄文学史上应记上一笔,特别是在黑龙江文学史上应重记上一段。李延龄教授提出编辑出版《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的想法是填补世界文学史空白之举,况且他用了多年时间收集大量上世纪原作,而且他在全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界中有影响力,有人才资源,这事可做。

由于这套书是文学出版物,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选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经济实力,经整合,我批准并向总署上报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五卷精装本《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的计划。部里请李延龄做该书主编,我和李延龄做编委会主任。还有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出版处,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做编委会成员。李延龄请了国内11人的翻译团队,翻译了95位俄罗斯侨民作家的小说、诗歌、回忆录等作品。

经过3年努力,《丛书》面世。在未成书之前,延龄教授将书的大体内容向中俄有关人士通报,请他们为本书做序,还将样书送给两国专业人士审读。反馈的结果令人兴奋。他们认为这套书对中俄文学有着重大意义,是把深埋的文学宝藏挖出来了。

2005年5月,我国俄文翻译界老前辈孙绳武先生在《贺词》中说,“百年即将过去,即使在一些曾为俄罗斯侨民聚居而闻名的城市里,也只有少数中国人还记得他们。许多历史学家也无暇注意这一段不大的插曲。”“就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文学遗产。这些遗产在淹没与遗失中艰难地生存下来一部分,我们才能在多年之后重新听到他们的心声。”“毫无疑问,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应当感谢这些侨民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应当感谢这些作品的热心收集者、翻译者和出版者”。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瓦列里·嘎尼切夫在发表的《卓越的创举》中说,“出版20世纪前半叶曾生活在哈尔滨、上海和散居各国的俄罗斯侨民著作,无疑是一项卓越的创举。这项工作的创始人是令人赞叹的斗士李延龄教授以及中国作家和学者,这不能不在每个俄罗斯人心中引起震撼。”“中国侨民文学,这是我们当代读者长久以来尚未发现的一座冰山。”“总之,我们亲爱的中国同行兄弟正从事着一项伟大而永恒的事业,一项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来说将是永存于俄罗斯人记忆中的事业”。

应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和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文化厅的邀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我和李延龄教授任团长,率领于文杰、王晓明、梁春芳、安振家和安璐等7人,作为《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出版代表团访问阿穆尔州、莫斯科、圣彼得堡,与俄方有关专家、读者和官员开座谈会,举行赠书活动。

2003年4月8日,我们在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召开了座谈会,并举行赠书仪式。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阿穆尔州作家协会主席伊戈尔·伊戈纳浅克和李延龄主持会议,我做了致辞,李延龄教授就《丛书》材料的积累、翻译、出版、中国俄侨文学研究概况及文学价值,用俄语作了介绍。阿穆尔州州长科罗特科夫、文化厅长米舒宁等都讲了话。普京总统驻阿穆尔州代表沃沃沃热洋溢地说,“普京总统及其俄罗斯政府,欢迎一切能为俄中两国伟大人民亲近的举动”。科罗特科夫州长说,“《丛书》出版毫无疑问是国际水平的”,“这为两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现在我的任务是把李延龄和他的同行所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创造条件在作者们的祖国俄罗斯用俄文出版类似的《丛书》”。

4月9日,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座谈会和赠书仪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李福清,莫斯科大学兼高尔基文学院教授华克生等学者、专家、官员30多人及一些作家、读者出席会议。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一副主席谢·雷克申主持会议并讲话。有十多位与会的专家、学者、作家、官员发言。他们从各个方面对《丛书》称赞,并要求加强文化交流。

4月19日下午,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部长·什维德科依见了我们,并举行座谈。部长先生说,“你们所成就的事业,是令人震惊的。”“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尚不能保证人文科学发展的条件,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你们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因为我认为,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文学的杰出人物是很重要的。伟大的中国文学接受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这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俄罗斯著名诗人马斯洛夫博士多次到过中国,喜欢中国诗歌,熟悉中国文化,大概和延龄教授熟悉,请我们到他家做客,设宴款待我们。他请了几位朋友作陪,他女儿是位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席间为我们弹奏钢琴。他将近期出版的诗集送给我们,并拿出我们的《诗刊》杂志,那上边发表了他的诗,确实写得很好,我们大加称赞。

在圣彼得堡正逢他们建城300周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与校长、专家、学者座谈十分热烈,与在阿穆尔州和莫斯科大体相同。与会者称赞这件事填补了俄中文学史上的空白,做了件伟大的事情。俄中两国友谊历史悠久,对当时进入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友善相待,不仅使他们有很好的生活,还使他们有文学